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2.4

中國社會學何處去？

孫立平

社會學與明星

Robert Van Krieken
Vedat Milor

拉美的暴力與抗爭

Johanna Parra
Nadia Rodríguez
Milton Vidal

- > Beirut 2012年執行委員會議
- > Johannesburg 2011年社會學實驗室
- > 社會學旅程
- > 阿拉伯抗爭
- > 社會學是單數或複數？
- > 編輯介紹：伊朗團隊
- > 法語社會學
- > 歷史一隅：更多關於AISLF的歷史
- > 印度社會學的挑戰
- > Ankara大學的公共社會學
- > 民主化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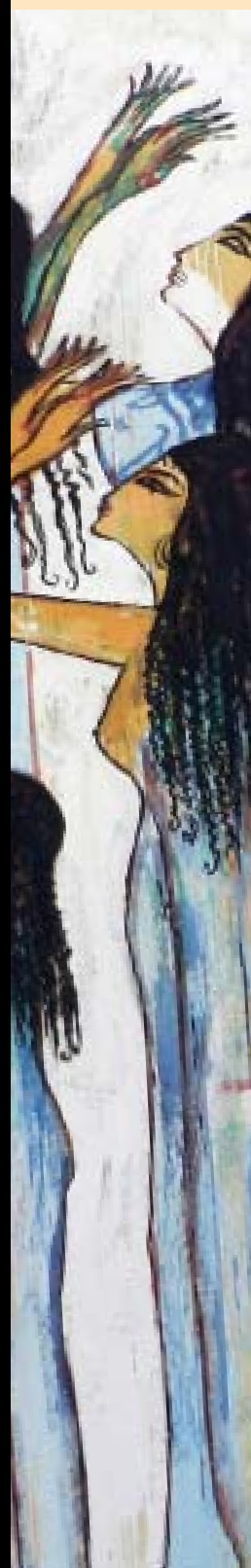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二卷 / 第四期 / 2012.5

GDN



> 主編的話

線上ISA—社會學的未來

全球對話已經出版2年了。我們從8頁增加到30頁，從最基本的頁面演變成特殊的版面設計，也從通訊變成了一份雜誌。它以電子化的形式出版，但是我的包包裡總是裝了好幾種語言的紙本。它提供了認識世界的社會學視野，也是ISA的大小事，如會議、辯論、特集、各國社會學資訊的彙整專輯。最重要的是，這份通訊在不同編輯團隊之間它開啟了一個對話的空間。例如這期就有來自波蘭Warsaw的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 對於上一期全球對話中，關於社會學的普遍性與個殊性討論的文章。總之，我們擁有了一個年輕社會學家的網絡，開創了世界社會學的多元性。

串起了這個全球社群的原則相當簡單：Public Sociology, Live! 我們有一群傑出的社會學家，深深鑲嵌在每個學者從事研究工作的國家裡，然後跟Berkeley的大學生討論學習社會學的生命歷程。透過Skype，這些學者不必出遠門接受訪談，而且所有的訪問記錄倒可以在ISA的網站上看到(<http://www.isa-sociology.org/public-sociology-live/>)。在Barcelona, Tehran, Johannesburg, Sao Paulo, Kyiv, 和Oslo的師生都可以看到，並且討論和張貼自己的意見在[facebook](#)，藉此深化辯論。我們因此等於是建立了一個網路的論壇，實驗室，以及學院，讓大家透過溝通討論一起實踐全球社會學。

社會媒體可以強化或是深化面對面的互動過程，即使是面對全球的觀眾也是如此。因此，一系列由Laleh Behbahanian負責的「社會學旅程」([Journeys through Sociology](#)) 訪談了世界各地的ISA執委，讓我們認識到他們接觸社會學的契機與所面臨的挑戰。多數的ISA會員之前未必有機會可以看到這些人，但是現在只需要點一下滑鼠就可以了！這就是一個絕佳的範例，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下載，模仿，改善這個方式。網路或許會讓教育品質低落，但也可以增進教育品質。網路可能降低溝通效果，但也可能深化彼此的對話。只要我們控制了網路，我們就可以決定怎麼去使用。

全球對話每年發行5期，以14種語言刊出。讀者可以在[ISA website](#)閱讀全文。投稿請寄給Michael Burawoy: burawoy@berkeley.edu



中國社會學何處去？中國著名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學家孫立平接受訪談時談到了中國社會學在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解釋為何中國的經濟發展趨緩停滯。



論學術明星化—Robert Van Krieken討論名人現象已經進入學術界，建立了類似好萊塢的明星體系，於是贏者全碗捧去，學術作品淪為在市場上競價的商品。



從社會學教授到美食專家—各位，你想轉行嗎？土耳其的社會學家Vedat Milor將告訴我們他如何搖身一變成為了家喻戶曉的電視人物。他現在是黃金時段的美食節目主持人。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編: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Fabio Silva Tsunoda,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sch Shahvand, Fatemeh Moghaddasi, Saghar Bozorgi, Nastaran Mahmoudzadeh, Najmeh Taheri, Tara Asgari Laleh, Milad Rostami

日本: 西原和久, 芝真里, 姫野宏輔, 高見具広, 岩館豊, 池田和弘, 福田雄, 三部倫子, 佐藤崇子, 小川翔平, 井出知之, 堀田裕子, 小坂有資

波蘭: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Michał Chełmiński,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Adam Muller, Wojciech Perchuć, Anna Piekutowska, Anna Rzeźnik, Konrad Siemaszko, Zofia Włodarczyk

俄國: Russia: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Mustafa Aykut Attar.

媒體顧問: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線上ISA—社會學的未來 2

中國社會學何處去？

訪談孫立平，中國 4

> 名人

學術明星化

by Robert Van Krieken，澳洲 6

從社會學教授到美食專家

by Vedat Milor，土耳其 8

> 拉美的暴力與抗爭

綠寶石暴力

by Johanna Parra，哥倫比亞 11

哥倫比亞的土地償還

by Nadia Rodríguez，哥倫比亞 13

智利的學生運動

by Milton Vidal，智利 15

> ISA動態

2012年執行委員會議

by Michael Burawoy，美國 17

2011年社會學實驗室

by Tina Uys，南非 20

社會學旅程

by Laleh Behbehani，美國 21

> 會議

阿拉伯抗爭

by Amina Arabi and Julian Jürgenmeyer，黎巴嫩 23

社會學是單數或複數？波蘭觀點

by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波蘭 25

> 特輯

編輯介紹：伊朗團隊

by Reyhaneh Javadi，伊朗 27

法語社會學

by André Petitat，瑞士 28

歷史一隅：更多關於AISLF的歷史

by Jennifer Platt，英國 30

> 地方

印度社會學的挑戰

by Ishwar Modi，印度 31

Ankara大學的公共社會學

by Günnur Ertong and Yonca Odabaş，土耳其 32

民主化未來

by Markus S. Schulz，美國 33

> 中國社會學將往何處去？

訪談孫立平

此訪談由Michael Burawoy（以下簡稱布）在沈原、胡麗娜、陳秀英等人的協助下所進行完成。孫立平（以下簡稱孫）是當今中國很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是北京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



孫立平，著名中國社會學家，正在解釋何謂轉型困境。

布：近來你對中國發展的停滯多所著墨，並提出了「轉型困境」(transition trap)的說法。請問你所謂的轉型困境的內涵為何？

孫：轉型困境指的是在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利益結構阻止了進一步的改革。那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會想要維持現狀、制度特徵，並且建立「混合制度」以進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這樣的狀況導致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扭曲，並衍生出許多相關的問題。相較於蘇聯和東歐，中國的轉型是屬於循序漸進模式，而這也正是問題所在。此種改革的短暫成功為日後的改革進程設下了重重阻礙。

布：能不能請你再多解釋一點？

孫：中國經濟的成功導因於政府對所有資源的獨佔和管理。這樣特別的發展模式其實是建立在貪腐的官僚和政府的尋租制度之上的。隨著這個掌握大權的官僚體系的擴張，通往真正的市場經濟或法治的道路也因此受阻。

布：你是中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這對你意義為何？你怎麼把社會學知識傳播給公眾？而這樣的公共社會學又怎麼影響了你？

孫：我想說明一下傳統社會學和公共社會學的差別所在。傳統社會學的主要目標是生產關於社會生活的知識。透過這種方式，社會知識可以透過間接的方式影響社會，而且多數是非預期的後果；相較之下，雖然公共社會學也生產知識，不過其主要目標是在於對社會產生影

>>

響。若用Robert Merton的話來說，傳統社會學顯性功能生產知識，而隱性功能影響社會；而公共社會學則正好相反。

在研究主題和建立理論的方法上，上述兩者也有所差別。在中國，我們選擇的研究主題都是以那些當前重要的社會問題為優先考量，例如轉型時期的社會結構變遷、社會矛盾與衝突、改革困境等等。所以我們社會學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影響大眾對社會議題的瞭解，並且影響政府的決策。

影響的管道主要有三種：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以影響這個學科的走向；在媒體上發表言論(包括社會媒體，如Twitter)以影響大眾；撰寫研究報告以影響政府的政策制訂。然而，我們並不會直接介入社會行動之中。

布：你怎麼看待社會學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

孫：因為中國是一個歷經巨大變遷的轉型社會，所以社會學對於大眾有著深遠的影響。當今中國的社會學既可影響大眾認知，也可以影響政府政策。像是由社會學者提出的鄉鎮企業(VTEs)的工業化模型，以及結合鄉村和城市的發展模式，都成為了政府的地方政策。此外，特別是在工作單位制度廢除之後，由學者提出的「社區」的理論概念也成為了官方文件的主要用語。

布：什麼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當前困境？有什麼議題是你們不能談論的嗎？或是你有什麼特別的方式去迴避敏感的議題呢？作為國家的批評者，你怎麼保護自己？

孫：在中國的確有許多事情是不能談的，但有一點很重要的是，現在的言論空間之大，可能遠遠超出你所能想像。許多公共議題都可以直接談論了。事實上一些敏感的問題在經過技巧性的修飾之後也可以碰觸，像是可以藉由談論歷史來論及當今的現實問題，或是藉由討論蘇聯或東歐來評論中國的議題。拜網路所賜，如Internet, blogs, twitter, 加上由於言論管制寬鬆許多，敏感議題已經被廣為談論了。我應該再加上社會學的客觀性、對資料的強調等的科學性質，去幫助拓展這個言論空間，使其更加開放。

布：你是怎麼開始接觸社會學的？據我所知，你花了很長的時間在作農民的口述歷史，你從這樣的研究中學到了些什麼呢？

孫：我本來是學媒體傳播的，在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我改讀社會學。那時正逢社會學在被禁止了30年之後剛剛開始重建的時期。在1980年

代我的興趣是現代化，因為那是中國社會當時最核心的問題。我的口述歷史研究從1996開始，目的是瞭解農民的日常生活和共產主義實作。我們企圖從文明化轉型的角度去分析中國的市場改革。這樣的過程在社會生活中被組織起來，並鑲嵌在日常生活實作中。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到鄉村去訪談農民在革命時期的經驗的原因。

布：你怎麼看過去這30年的中國社會學？又怎麼看待未來的前景呢？

孫：美國的學術界關心的是知識的累積，歐洲關心的是價值，而中國關注的則是現實問題。易言之，中國學術界向來有著關照現實的傳統。然而，由於受到美國的影響，中國學界對於現實問題的關注已經日漸減少了，社會學似乎變成了研究自己的一門學問，而非研究社會。即使是研究社會，其所生產的知識也是片斷的。

我始終認為研究社會轉型是相當重要的，特別是透過檢視這個過程和事件。即使我們關心社會學本身的發展，但上述我所說的任務還是很重要。社會學的開宗祖師都共同關心資本主義文明化；另一方面，共產主義毫無疑問地代表了人類歷史上的另一個文明化過程。其擁有和西方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制度、價值、和邏輯，並且在近來來正歷經歷史性的轉變。我相信對於共產主義文明化之特色、邏輯、過程的研究，會成為社會學新或是更廣義社會科學的啟發和動機來源所在。 ■

> 論學術的明星化

by Robert van Krieken, University of Sydney, 澳洲, ISA財務與會員副會長



| Pierre Bourdieu：反對明星化的學術明星

今日的大學已經分化成三個階級，而且界線愈益分明：

- 菁英階級。他們專注於研究，只需要負擔很少或者甚至不用負擔教學與行政的責任。
- 中產階級。這個階級需要同時教學與研究，以滿足越來越多的學生需求和教學品質的要求。研究品質是以菁英階級的標準為主，所以中產階級注定失敗，或是得努力地躋身菁英階級。
- 無產階級。他們通常只有暫時性的教職或研究身份，期待有朝一日成為正式教授或拿到終身職。

我們有很多種方式可以探討這個問題，不過在這裡我想從「名人理性」(celebrity rationality)的角度切入去闡述我的想

法。在支撐社會名流階級—演員、電視角色、運動明星—的社會經濟機制和大學的轉型之間，我認為存在著某種相關性。我的研究計畫已經開始去分析名人和社會學的一些核心概念(如不平等、認同、權力、治理等)之間的關係，而學者是明星社會中典型的例子。

在Robert Michels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已經討論過這個議題了。不過，我認為C. Wright Mills的貢獻最大。他論及了社會透過某種獨特的競爭方式去生產出一批名人階級，亦即把特定的一部份人視為名人權貴。這些人是具有高度可見性的「表演者」，並且是其他競爭場域在認知和實踐上的參照點。在Power Elite (Oxford, 1957: 74)一書中，Mills說：

在美國，這個體系讓某些個人擁有讓小白球可以連續進洞的本領，最終目的就是坐上總統寶座。這個體系也讓廣播或電視談話節目的主持人或演員可以有機會成為公司執行長、政府閣員、以及高階軍事人員。這和一個人好不好沒什麼關係，只和一個人可不可以從這場競爭中脫穎而出有關。一旦取得勝利，他就成為明星了。

這樣的描述不全然精確。雖然搖滾明星可以選總統，但是會打小白球的人還是略勝一籌。重點在於可見性和可辨識性的傳播本身變成了一種資源和價值，並且獨立於其當初的生產過程。

Robert Merton將這樣的問題視為是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是從馬太福音25:29

>>

中而來：「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他說，得到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會比他的同事獲得更多的注目眼光，而和研究的價值沒有關係。受到矚目這件事可以為學術人員財富，而所帶來的財富是自我累積式的，而且只要待在學術圈，就會一直累積下去。Herbert Simon在1971年時也曾提及這個觀點。他指出，當資訊和知識的生產有所剩餘的時候，稀有資源就會變成大眾的焦點事物。受到關注這件事情本身可以引導大眾的認知方向。關注，是一種「位置財」(positional good)，如Richard Sennett在討論音樂時所說的「星狀系統」(star system)，某些音樂家可以超越僅僅成為一個傑出音樂家的層次，成為鎂光燈的焦點，進而成名，然後排擠掉其他傑出的音樂家。

當全球的大學愈來愈計較排名，並且大學評比標準越來越瑣碎化的時候，在大學之間、教授之間、國家之間就形成了一種類似前述所言的競爭體系，進而生產出一批又一批的名人——明星教授和明星大學。或許文獻引用可以用來評斷研究的品質，但是，這也可以用來作為衡量該篇文章作者的明星程度。我們引用Bourdieu或其他人並不只是因為這代表了我們研究的某種獨特性，還表示了我們知道Bourdieu這個人。

這樣的學術名望系統在三個層次上運作：個人(通常是研究者，而非教師)、大學(大學)、國家或區域(國家或是國家組織)。或許我們的比喻有點走得太遠了，不過在很多方面而言，他們的確都渴望、或是被迫渴望成為某個學科或是全球學術體系中的Kim Kardashian。就如同Kardashian的能見度會影響到其形象與品牌的支持和銷售，大學排名也會影響到招生、社會地位、以及募款。這也是為什麼大學都花那麼多時間和金錢在建立自己的品牌上。

我們可以從大學聲望和大學轉型之間

的關聯性分析中得到什麼啟示？這邊我們沒有辦法深入討論這個問題，但我可以試著舉出幾種討論的可能性。第一，若我們能夠辨識到這整個系統其實就是一個關注的生產與分配的體系，而關注本身就是一種資源，並且無關乎學術研究本身的價值，那麼，我們就可以從更質疑與批判的角度去看待大學正在玩的這個場爭奪地位的遊戲。瞭解到這個菁英體制其實就是一個名人體制，那麼大學的危機就是一場爭奪關注焦點的鬥爭。

第二，若我們在玩的就是一場爭當明星的遊戲，那麼我們可以觀察其他更廣義的名人遊戲，應用相似的策略到學術場域中。我們都知道Andy Warhol說過：未來每個人都會成名15分鐘。而後來他改口：每個人在15分鐘內都可以成名。我們將可以在其他更多的場域發現這項機制。

相較於接受學術地位的階層體系(類似好萊塢的明星地位)，我覺得更好的方式是去由下而上發展出自己的學術評比標準，不是去追求明星光環，而是去區辨什麼是好的和有用的學術研究。打破贏者全拿的遊戲規則是可能的，關鍵在於只要我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每一個人身上，而不是只把眼光投注在學術明星這件事情上面。 ■

> 成為名人

從社會學教授到 美食專家

by Vedat Milor, Istanbul, Turkey



美食專家Vedat Milor：這東西吃起來似乎並不怎麼樣。

讓我們來想像一下這幅景象：電視裡面的那個人參加一場靈修的聚會，正在虔誠祈禱著。他用手撐著頭，眼睛注視著某一個地方。忽然間他的手機從口袋裡掉進了海裡，引起了一陣騷動。然後鏡頭就轉到了一個高瘦男子的身上，門牙少了兩顆，穿著烹

飪圍裙。比較奇怪的是我們的電視主角似乎並不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不幸的事，反而走向廚師，問說：「為什麼你這道菜加了蘋果醋卻不用白酒醋？」

一想到這個畫面，我就會忍不住笑個不停呢！我其實是用一種消遣和難以置信的眼光在審視著自己。這可不是什麼電視實

境秀喔，而是土耳其NTV的週末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而我就是電視裡面的那個人。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吃遍各個餐廳，品嚐佳餚美食，判斷好不好吃，說說自己的批評，並聽聽主廚們怎麼向我解釋。若餐廳裡有很多種酒，我就會讓他們每種倒一杯給我試喝，看看夠不夠水準

>>

。

有兩位攝影師和一位製作人和我一起逛餐廳。大多數的時候我們是在土耳其，不過偶爾也會到羅馬、加泰龍尼雅、喬治亞、敘利亞、黎巴嫩等地。每次拜訪完一間餐廳，我會做出兩到三分鐘的評論，然後給星星評等，從一星到五星級。只要是被我評為四星或五星的餐廳，即使那個餐廳之前門可羅雀，最後都會吸引一票顧客上門然後大賺一筆。

你們一定認為我是土耳其的阿基師。別鬧了，我連打蛋都不會呢！但我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明星，因為走在路上總是會有路人來要跟我索取簽名照。大家也在網路上熱烈討論我這個人，我的個性、動機，且很好奇我的私人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也很多大學生一直寄信來問我要怎麼樣才可以變成和我一樣有名。更有許多中學生的家長要我出書，讓他們知道怎麼樣才可以把小孩教成和我一樣。在他們眼中，我是「偶像」，他們的小孩日後都想成為另一個「Vedat Milor」！

好，那到底我是誰？這整件事情到底怎麼發生的？30年前，這個人從Bosphorus University經濟系畢業，然後到美國的Berkeley社會系念博士。大學的時候著迷於斯拉法、新凱因斯學派、阿圖賽、以及法國結構馬克思主

義；但到了Berkeley，他開始喜歡上民族誌，從事深度個案研究去瞭解社會變遷。他的指導教授Michael Burawoy告訴他比較方法才可以發展出一個解釋資本主義國家自主性的理論架構，例如土耳其。所以最後他比較了土耳其和戰後法國的經濟，企圖說明核心和邊陲國家的結構差異與國家自主性。

在這裡我想要為我的「無辜」解釋一下：喜歡法國紅酒是我選擇法國作為論文個案的「非預期後果」。可是，實際上並非如此。自從在1982年我花了10元在Berkeley的Kermit Lynch Wine Merchant買了1982年的Henri Jayer Bourgogne之後，我就愛上了勃艮地紅酒了。我那時連一台收音機都買不起，但是卻喝很好的紅酒。好的紅酒有著多層次的香氣，多變的特質可以挑動與刺激我的味蕾。她的質地很柔很精緻，吞嚥入口後卻又有另一番令人驚訝的強韌與辛辣。如此地複雜與迷人，完全體現了布爾喬亞民主和西方文明化所令我著迷之處，截然不同於單調乏味的美國Reagan政府和土耳其的Kenan Evren的軍事體制。

「但是為什麼你要比較土耳其和法國？」一位Fulbright獎學金的審查人這樣問我。我到現在仍然清楚記得她在聽過我的答案之後的那張驚訝的臉。

我回答：「因為美酒和美食。」當我拿到獎學金之後，我猜想她必定是同意我的吧。我說的可都是真的。Malcolm Gladwell在他非常有名的著作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一書的「1萬小時理論」中說：有些人是天才，但是絕大部分的成功人士都是工作狂，至少花上了1萬小時才得以精通了某項才能。所以，我也可以有一個「1萬瓶紅酒理論」，可不是嗎？我很可以肯定在1985和1990年我還是研究生的時候，我餐加了很多俱樂部和聚會，所喝過的紅酒，差不多就是這個數字。

畢業之後的時間就過得非常快了。我後來到世界銀行當政治經濟學家，但是當我的論文得到美國社會學會的最佳論文獎時，我又回到了學術圈，在Brown University和Georgia Tech教書，後來又在Stanford拿到了一個法學學位，並被選為傑出法律學人(Order of the Coif)。我也曾經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訪問過一年，有幸可以親近這個世紀最偉大的大師之一Albert Hirschman；我也在矽谷的一間新公司工作。

但是當在矽谷工作過之後，我從此就對學術就失去了熱誠。在Georgia Tech公共政策系的計畫「如何利用Geogia交通部的

外部諮詢顧問去提昇效率」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發現我一點也不想成為技術官僚，對我同事的問題一點也不感興趣，我想要做點什麼別的事情。

我在世界銀行的一個朋友後來當了土耳其非常有名的報紙Milliyet的主編，他當時正在找一個懂酒和食物、且有公信力的人。於是他問我是否可以幫他寫個每週專欄。從那之後我的人生就開始像是坐上了雲霄飛車一樣，充滿驚奇。

我出名了的這件事可以有個理論性的解釋嗎？我想有。讓我出名的原因就和是得以讓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在2002年執政一樣。之前的執政黨是世俗的軍事官僚菁英和一群布爾喬亞階級的聯盟，後來失去了對政治經濟控制。再加上政治的貪污與經濟危機，AKP的伊斯蘭民粹主義訴求公平和透明，在執政黨的分裂中佔到了優勢，並從獨佔的資本家中找到了

支持者。AKP也動員了邊緣的安那托利亞的布爾喬亞，都市商人、建築商、保守受過教育的年輕族群、以及搖擺不定的都市窮人。

我其實很驚訝我的節目可以在安托利亞人和都市窮人中受到歡迎。中產階級當然可以買得起紅酒和美食，但那些都市裡的窮人和年輕人有怎麼說呢？我其實受惠於我是個外來者的身份。我不是食品產業裡面的老面孔，也和餐廳與食品工業之間扯不上半點關係。

不過我想還有另外一點很重要的因素得以使得我在年輕人之中也受到廣大的歡迎。在AKP執政之後，伊斯蘭的禁慾主義和壓抑的文化開始抬頭，再加上政府對於社會抗爭的鎮壓，使得年輕人只好把精力專注在想像力和娛樂文化上，從中得到解放。政府對媒體的管控和對社會的壓制一方面帶來了恐懼，但另一方面也激發了想像力。年輕人認為政治是骯髒的，並且要懂得欺

騙才得以成功。所以，他們父執輩可以輕鬆品嚐佳餚美酒的文化變成了他們想像上可欲的另一個自我認同。相較於困苦的生命和受限的理想，人生若是可以盡情探索「味道」這件事情，那是再好不過的了。

或許我就是他們眼中的Jayer Bourgogne，讓他們得以在非常惡劣的文化與經濟環境中強化精神上的能量，解放受到壓抑的感官。這種「奇怪的理想主義」是名人文化和名人作為偶像的反面。就像馬克思說的：「名人文化的死亡必須先是名人的解放。」 ■

> 綠寶石暴力

by Johanna Parra, Universidad Icesi, Cali, 哥倫比亞



沒有國家比哥倫比亞還有擁有更多的祖母綠。爭奪資源的家族讓礦業變得充滿暴力。圖為一個工人在計算自己的寶石數目。Jan Sochor 攝影。

在哥倫比亞，派系暴力已經成為了社會學的分析主題了，而且漸漸有演變成「暴力學」的趨勢。哥倫比亞社會學一開始是研究歷史上的La Violencia (1945-1965)時期，以一本非常具有啟發性的書La Violencia en Colombia. Estudio de un Proceso Social (1962)為基礎，其作者是Bishop Germán Guzmán Campos, Orlando Fals Borda, 和Eduardo Umaña。這部著作以社會學的角度和結構貧窮為核心概念去解釋什麼原因導致了社

會暴力。1948年4月9日發生的Jorge Eliécer Gaitán (Liberal Party的元首)的暗殺事件是其中最為特殊的一起事件。這起事件把社會與政治的暴力想像徹底實現，但是「社會實體」分裂的真實原因是象徵上民族國家的缺席。

許多政治、軍事、宗教的組織動員人民拿起武器、以生命為代價去反對其政治上的對手。哥倫比亞的主要政黨是自由黨和保守黨，他們都是從獨立運動(1810-1830)而來的。從那時起，暴力也就鑲嵌

這個國家的日常生活中。在1863-1886年間發生了9次內戰，成為了派系暴力和對抗的歷史根源，一代傳一代。此一觀點在Daniel Pécaut的Order and Violence一書中有很清楚的說明。

暴力學把研究範圍延伸到各個時空，是哥倫比亞社會學的核心議題，也是瞭解哥倫比亞社會與歷史的起點。不過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我們還是得建立更多的歷史和民族誌，才能夠瞭解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我的

>>

研究就是朝這個方向進行的。

La Violencia時期導致的不只是軍事戰爭、流血與死亡，還把野蠻文化帶入了日常之中。La Violencia時代的尾聲，也是1960和1970年之間的冷戰時期，許多組織組成武裝馬克思游擊隊。其中的哥倫比亞革命軍(FARC)來自自由黨的武裝分支，至今仍相當活躍。其他的武裝組織則是來自於保守黨和毒梟。無止無盡的暴力衝突造成了系統性的恐怖與殘酷，讓許多人流離失所。暴力深深地鑲嵌在日常生活中，侵入了親密關係領域，造成極大的痛楚，且一代傳給一代。

讓我說明一下我對綠寶石地區的相關研究。這是一個在東安地斯山脈的地區，人口8萬人，距離Chiquinquirá (是Department of Boyacá的地方首都)有40公里。近10年來，這個區域的經濟從農業轉變為礦業。這位一小部

分投資礦業的人帶來的巨大的財富。巨大的轉變造成了家族的分裂和產生了新的結盟。這些積極挖祖母綠的家族所組成新的新結盟需要企業家和警衛的合作。這也鞏固了原本農業中的黑手黨家族，使得流血、榮譽、忠誠等文化得以延續。這和Anton Blok 的書*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 A Study of Violent Peasant Entrepreneurs (1860-1960)*所描述的類似。

因為哥倫比亞政府無法管制這些暴力採礦的情形，1970年這些礦產掌控在黑道老闆的手中，地方上都稱他們叫做Dons。1960-90之間的戰爭就叫做綠寶石戰爭，是黑道們爭奪礦產地盤的戰爭。五千多人喪生。1991年，戰爭生還下來的Dons簽訂了和平協議，可是暴力沒有就此銷聲匿跡，因為毒梟的軍隊出現了。新勢力的出現讓地方的家族必須再次面對這些武裝衝突

，更進一步加深了暴力文化。

哥倫比亞其他的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發生。暴力進入到了最私人的領域，進入了家庭，進入了教養之中。這些都導因於經濟快速成長和國家的無能管制。雖然在道德和政治上很令人失望，不過另一方面也是社會學得以進入分析和國家得以介入管制的地方。 ■

> 哥倫比亞的 土地償還

by Nadia Margarita Rodríguez, University of Rosario, Bogotá, 哥倫比亞



就像圖中的這位老人，在哥倫比亞，有400萬名農人被迫在過去15年放棄自己的土地。Julián Vasques 攝影。

哥倫比亞土地償還的爭議肇因於1448法案的通過，這個法案也被稱為受害者法，在2011年6月10日通過。這在政治、經濟、社會上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因為國家承認了武裝衝突的事實。特別的是在法案第三章決議償還土地給過去20年那些在衝突中流離失所的農民。這是50年來哥倫比亞暴力衝突的縮

影。此法案之所以爭議就在於政府的支持角色事實上等於說明了過去政府的消極作為。不過，雖然大家都很努力，不過要實施這項法律還是困難重重。

土地償還議題必須要从哥倫比亞的土地所有權高度集中化的脈絡來理解，這也是農業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許多學者認為

>>

這不只是造成嚴重經濟與政治不平等的原因，還是嚴重暴力衝突的罪魁禍首 (Fajardo 2002, Machado 2009, PNUD 2011)。土地集中化導致了兩極化的農業結構，一小部分菁英掌控了大部分的土地。1這在殖民時代變是如此，如今情況只是更加惡化罷了。在1936-1961間的農業改革失敗後 (Molina, 2000: 36)，武裝組織在1960年代出現後開始要求歸還土地。因此，大部分的哥倫比亞鄉村被這些武裝部隊所控制，造成了系統性的暴力和近400萬人的農民被迫離開家園。所以，土地償還最困難的一點就是對象實在太過於龐大了。

因為法律限制和相關的社會脈絡，所以情況相當複雜。University of Rosario的發展研究中心採用跨學科的方式(結合法律和社會科學)企圖去理解法律實行的挑戰。其中一部份的研究是由土地償還部門所委託。2這項研究的挑戰有以下5個：

- 第一，在土地償還地區裡，武裝暴力還是持續不斷發生，所以沒有辦法保證農民不會再失去土地。最大的挑戰就是保護這些農民免於武裝暴力的襲擾。

- 第二，法律主要定義土地償還為給予頭銜和補償，不是補償任何人和土地的傷害與損失，也不能恢復之前的狀況。法律不能被限定再只給予土地，而

必須確保人們能有尊嚴的在那生活。況且這些受害者受到的傷害不僅是物質的，還包括心靈的創傷，包括許多違反人權的事件。這讓他們更難返回土地生活。所以這些人需要的不只是法律，還要其他更多的資源去支持。

- 第三，那些失去土地、現在住在城市裡的農民未必願意回去，因為農村擁有的教育、健康、發展等的資源極為缺乏。而且他們失去了原有的社會關係，這讓他們更難重建家園。

- 第四，若地主要生活下去，經濟、科技、生產的資源是必須的。而不是用租的或賣給大公司。

- 第五，我們還有法律和制度面的挑戰要面對，包括了訓練公職人員去執行償還政策，或是農業法官的訓練(在哥倫比亞尚未存在)。國家要證明侵佔土地的情形確實發生過。由此一來就產生另一個問題：國家要怎麼從現有的地主中拿回土地？而且那些買主是經由法律所允許的。

最後，在國家和地方菁英之間的衝突也是另一個政治問題。這些衝突圍繞在土地上或土地下的資源爭奪。一些著名的例子，例如 Curbaradó、Jiguamindó 或是 Hacienda Las Pavas，證明了即使法律爭議解決了，地方上的權力菁英還是會想盡辦法阻止土地歸還政策的實行。 ■

註解：

1. 土地基尼係數可以測量土地的集中化程度。越接近1代表土地越集中。哥倫比亞是0.87，是全世界土地最集中化的國家。

2. 這是為了要實施此一法律所設置的政府單位。前身是Program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nd and Dispossessed People (PPTP)，但這不如現在的這個部門擁有政治與法律的支持，目的也不一樣。

References

Fajardo, D. (2002) Para sembrar la paz hay que aflojar la tierra. Bogotá: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Machado, A. (2009) La reforma rural, una deuda social y política. Bogotá: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CID.

Molina, P. (2000) “Reforma agraria? No es tan claro para qué el país la necesita.” *Economía Colombiana* 278: 34-7.

PNUD (2011) Colombia Rural: Razones para la esperanza. Informe de desarrollo humano 2011. Bogotá: INDH PNUD.

> 智利的學生運動

by Milton L. Vidal, Academic University of Christian Humanism, Santiago, 智利



智利學生運動。口號是「不要出賣我們的未來！」

智利是南方小國。由傳統的製圖學視角，你可以在南美洲的末端找到我們。你也可以在報紙的頭條新聞上常常看到智利。2011年，智利由大學生和中學生組成的學生運動引起了各界廣泛的注意。

我們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三分之一的貧窮人口，並且遭受到暴力、虐待、貪污、搜刮稀有資源等的

傷害。在這個脈絡的其他國家裡面，通常男人、女人和小孩會一起集結起來要捍衛自己的理想，要求保障基本人權，要求政府兌現競選承諾，做出符合大眾利益的決策。所以智利人民也不例外。有許多原因造成智利人民的不滿而走上街頭，有些甚至比學生的社會權益等議題來得更加明顯。我們不能忘了：智利是從1970年開始南美洲第一個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其中特別是大學教育的部分。

為什麼智利學生要走上街頭？為什麼其他國家都覺得智利的學生運動非常具有正當性呢？簡單來說，新自由主義的承諾跳票了。的確，確保所有人的大學受教權這項承諾反而帶來了不好的結果。大學生的增加同時讓更多的家庭負債累累。智利是學費出了名的貴的國家。所以學費大多由貸款支付。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這是一個財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國家。¹這點特別重要，因為高等教育是公共財，而且是社會流

>>

動的關鍵所在。

在智利，家庭對於昂貴教育的投資可換取很好的報酬，而且學費還在持續升高當中。所以有人就是去買權力。總之相對昂貴的教育投資(小學和中學)可以進入好的大學(以成績或是靠關係)，可是那些負擔不起這些投資的人就會受到不平等的結果。所以，要求好的教育是一種反對社會不平等的訴求。

很令人驚訝的是許多訴諸捍衛高等教育受教權的社會運動每個星期都會發生，他們的要求和主張，以及參與的社會群眾，其實並不只是智利的現象。相反的，捍衛公共教育的運動在烏拉圭、玻利維亞、巴西、波多黎各、厄瓜多、哥倫比亞等地也很成功。不過，智利的例子還是很值得國際上的關注和討論。

第一，大學仍然是社會的晴雨表。不斷強調這個歷史事實似乎太簡單了，不過這麼簡單的事情卻常常被人所遺忘。政客該改革高等教育，可是卻一拖再拖，因為他們從不認為這是核心議題。而經濟領袖們則認為高等教育的品質可以透過公部門、銀行、家庭等挹注資源得到改善。錯！大錯特錯！大學議題遠遠超出政策的範圍。所有的社會變遷都和大學息息相關。當我們思考關於猶太人從古巴比倫王統治的波斯帝國中出走，柏拉圖的學院之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將聖經翻譯成德文，在University of Geneva的喀爾文教派，什葉派統治前後的伊朗，共產革命前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或是天安門廣場，墨西哥的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Tlatelolco massacre)等等議題，我們會發現大學一始終都是社會的重要制度。所以，教育必須是社會學的重要研究對象。

第二，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絕對不行被兩極化的市場和國家力量所決定。Humboldt以前認為國家總是干涉教育，這點是對的。拉丁美洲的人都知道國家總是體現其權力於官僚系統中。教育社會學家也清楚瞭解到改革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執行國家政策。然而，即使是Humboldt也認為教育改革不可能沒有國家。我們還是要要求國家確保教育的制度穩定，也需要國家去杜絕讓大學淪為個人利益的競技場。從這點而言，教育是公共財，大學是公共制度，不論大學是私立或是公立皆然。大學的教學、研究和外部功能絕對是公共的。大學得以授與文憑也是建立在社會對他們的信任之上。

第三，智利的學生運動，或是更廣義的在拉美，都拒絕教育的商品化。市場的組織邏輯和科學訓練的邏輯是不相容的。讓我們看看教授和學生之間是如何互動的就知道。教育是一種集體努力，不可能被當成商品拿去販賣。學生唯有透過參與科學活動才可能學到東西。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總是鼓勵學生參加討論，去寫報告，去參加研究小組，去分享、辯論自己的觀點。把教授和學生視為銷售者和顧客的想法是有問題的(而且必須用非意識型態的理由去反駁這種想法)，更是教育的絆腳石。我覺得可怕的是我學術圈的同事確有人也接受這種把學生當成消費者的想法。學生需要學術自由，並且學術自由取決於教授的自主性。可是今日這種自由已經被市場經濟所侵蝕了。若是教授被當成是服務的提供者，那麼教授就只不過是校方的雇員而已，如此一來，教授淪為只是在幫助老闆賺錢的手下。

最後，我必須說，學生運動對社會來說是件好事。大

學讓社會可以把自己轉換成研究主題，並在這過程中再次強調自身的重要性。利益和權力的鬥爭總是不可避免的，並有可能威脅到學術自由。可是，這些鬥爭不足以摧毀大學。這樣的觀點也是我們應該用來觀察智利學生運動視角，也可應用到拉美和世界其他地方。我認為學運對民主社會是有益的，社會和大學在這個意義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未社會學提供了很好的觀察脈絡。有些人認為社會學越來越不重要，那可錯了。社會學在全球南方仍然強韌有活力，我希望這點可以激勵各位讀者們！ ■

註解：

1. 智利是新興的OECD國。該組織的報告指出智利的基尼係數是0.5，這是這些國家之中最不平等的(Society at a Glance, Social Indicators, OECD, 2011)。若我們更進一步闡釋此一現象，就是智利最富有的前10%是高過於挪威的，可是最貧窮的10%和象牙海岸差不多。60%的智利人的平均收入低於安哥拉。

> ISA執行委員會議

March 19-23, 2012

by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SA會長



執行委員會議中的餐點。Markus Schulz攝影。

ISA為期五天的年度執行委員會議在University of Beirut (AUB)，由Sari Hanafi與其在社會系、人類系、以及媒體研究的同事慷慨負責主辦。其中兩天我們同時舉行了一場「阿拉伯革命」的研討會(在本期有相

關文章)。這個研討會由AUB、黎巴嫩社會學會、Friedrich-Ebert-Stiftung基金會協辦，並邀請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學者一起從比較的視野探討這個議題。

五天的會議分別同時進行不同的場次，包括了

橫濱世界大會的計畫籌備會議，由副會長Raquel Sosa主持；出版委員會會議，由副會長Jennifer Platt主持；財政和會員委員會會議，由副會長Robert Van Krieken主持；研究協調委員會會議，由副會長Margaret Abraham主持；

>>

最後是國家委員會議，由副會長Tina Uys負責。

在會議當週的最後一天進行為期2天的全體執行委員會議。我跟大家報告了我到各個國家的心得以及線上ISA計畫的進度(請見主編的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是2018年的世界大會要在哪裡舉辦。目前有5個很棒的申請案，分別是Budapest，Copenhagen，Melbourne，Zaragoza，和Toronto。我們最後決定2個決選名單：Toronto和Zaragoza。在拜訪前者之後就可以做出決定。另外我們決議接受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成為會員。以小組委員會的報告為基礎，我們開始思考是否要成立ISA獎，頒發給傑出的社會學研究。以下則是各位副會長的報告。

> Margaret Abraham，研究副會長

研究協調委員會(RCC)這次的Beirut之行收穫頗豐。我們討論了下列議題：研究委員會章程的修訂，主題和工作小組，所有RC、TG、WG的活動(2006-2010)，以及在2012年8月於Buenos Aires舉行的論壇。

會議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論壇的籌備事宜。目前我們收到了6,019份摘要，來自7,928位作者，共有693場次(51場為西班牙文)。世界各地的申請者中，拉丁美洲為最大宗

(3,528人，45%)。

雖然我們希望越多人越好，可是經濟的考量下，人數勢必得縮減。我們正在和Sage討論是否可以設立一個虛擬空間，讓知識可以傳播和教，以及分享與這次主題「社會正義與民主化」的相關研究。更進一步的資訊我們很快就會告訴大家！

關於RC/TG/WG規章的修訂，我們決定還是要由RC/WG/TG提供他們修訂後的組織章程。同時我們也考慮要求各個RC/WG/TG的委員會，利用特別的辦公時間去審查他們自己的組織。很多委員會必需要自己找出下一任的負責人。

RCC也審查研究獎金。總額\$16,900美金的獎金於2011年分配到了18個RC/WG/TG中，€8,660歐元將會於今年頒給13個RC/WG/TG委員會。出版副會長Jennifer Platt蒐集了各個委員會的簡介放到了網站上：http://www.isa-sociology.org/about/rc_aims.htm。

最後，我們對2006-2008和2008-2010的RC/WG/TG做出了回顧和檢討。多數的委員會都很積極籌辦會議和出版通訊，以及其他許多專業的活動。新版的RC/TG/WG活動申請表變得更有效率。

> Jennifer Platt，出版副會長

Sujata Patel是Sa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SSIS)的主編，Sage出版社將在印度出版這個刊物，ISA的會員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可以用印度的售價購買，不過這些精裝書籍也都會以西方的價格出現在西方的圖書館。

我們也達成共識讓國家學會可以翻譯印行(自行負責)任何Current Sociology (CS)或是International Sociology的文章，且不用付版稅。CS每年會發行特刊，將報括Sociopedia上的文章。

另一項政策是期刊主編和出版副會長要在每一次ISA會議中負責提供出版的相關活動，例如像是面對編輯，期刊寫作工作坊，面對地方編輯等等。每年他們也要出席重要的會議，觀察重要的發展，招徠新的作者、審查者等。

> Raquel Sosa，計畫副會長

我很高興告訴大家一件事：這次在Beirut召開的橫濱大會的計畫籌備會議非常成功。大會主題是「面對不平等的世界：社會學的挑戰」。我們已經展開徵稿，截止日期是2013年1月25日。相關資訊可以在ISA的網站上找到：<http://www.isa-sociology.org/congress2014/>。我們也很歡迎各位申請特別場次或是整合場次，以及作者面對批評者。我們希

>>

望各位將這次大會視為是一次參加國際級知識交流的難得機會。如同許多的ISA會員專長在貧窮、不平等、不正義等領域的研究，同樣地，希望在橫濱大會上看見大家對知識和實踐都有所貢獻。

計畫委員會也同意籌備10個半全體出席的場次，主題包括了：結構性不平等，不平等與權利結構，不平等的生產和實作，不平等的社會傷害，不同歷史文化脈絡下的正義概念，正義與社會體系，超越不平等，行動者與經驗，環境正義與永續未來，社會學與不平等。參與者將來自於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背景。我們希望在和在地籌備委員會的合作下，我們可以一起為21世紀的社會科學開啟嶄新的一頁。

> Tina Uys, 國家學會副會長

我們討論了集體會員的議題。集體會員是由國家學會或是財務與會員委員會所推薦，經由執行委員會認可。集體會員的規章必須和ISA章程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符合一致。

集體會員必須是非營利組織，而且是由從事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家組成。不論方法、理論、意識形態的差異，皆可加入。集體會員的目標必須是增進社會學知識。其組織結構必須認可社會學的期待，並以各種方式支持社會學家自由地發展社會學知

識。

集體會員的代表負責人必須經由民主選舉產生。

我們也決議在年度的執委會會議之間辦理集體會員申請。斯洛文尼亞社會學會在2011年中申請成為集體會員，一切申請與審核都在線上完成了。烏干達社會與人類學會的申請則在會議進行期間核准。ISA現在有60個定期集體會員，但可惜的是繳交會費的情況並不踴躍。

以墨西哥2011年國家學會會議的決議為基礎，地區會議補助將授予孟加拉、保加利亞、莫三比克、菲律賓。孟加拉和莫三比克也得到了網站發展補助。

國家學會委員會會議(CNA)正在計畫中，將在2013年5月在土耳其首都Ankara舉辦。主題是：「騷動年代的社會學：比較方法」。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的社會系和土耳其社會學會，以及土耳其社會科學會共同合辦。

> Robert Van Krieken, 財務與會員副會長

我們要項各會報告的是個人會員持續在增家中，現在已經超過5000人了。終身會員會費是€ 300，不過我們希望依國家而調整為：Cat. A - € 300，Cat. B - € 200，Cat. C - € 100。這要等到橫濱大會才可以作成決議。我們

也建議透過網可以讓捐獻更加方便的方式，以及研擬可以吸引到更多捐款的方法。

我們也提供了2010和2011財務報告，希望讓會員更容易瞭解。2010-2014的報告也會提供預算細節和來源。我們財務狀況良好。我們因為活動和工作人員的增加，支出增加不少，但是這和Sage出版社的2011年的貢獻相抵銷了。其他額外的支出已經核准給全球對話、社會學旅程、以及編輯的旅行支出。

> 其他

我們收到了橫濱大會在地籌備會主席長谷川公一鼓舞人心的報告。於是和我們在UN的代表 (Jan Fritz, Rudolf Richter, Rosemary Barberet, and Hilde Jakobse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Sociology of Law (Ramon Flecha) 以及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Emma Porio)一起討論了這份報告。伊慶春也告訴了我們2012年台北Laboratory for PhD Students的進度。此外，我們也署名寫了一份也署名寫了一份信件給歐盟，強調社會科學的重要性。

最後要謝謝合辦的單位，為我們在Beirut留下了美好的回憶。特別感謝在AUB的Sari Hanafi、Oubada Kassar、和Chebib Diab。此外也謝謝在場的工作人員以及ISA的秘書處，使得會議圓滿成功！

> 知識交流， 探索南非

Tina Uys,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南非, ISA國家副會長, 2010-2014



ISA PhD Laboratory到南非Soweto

博士班實驗室第10屆會議在2011年11月8-11日於南非舉行。地點是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Island，它位於靠近Vereeniging的Vaal Dam。一行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像是中國、伊朗、歐洲、美國、墨西哥、巴西，他們從50位申請者中脫穎而出。隨行參加的還有兩位南非的學生。同行的老師也很多元，包括了來自美國的Jan Marie Fritz，台灣的伊慶春，和日本的佐藤嘉倫。今年主題是社會排除、公民身份、社會資本。

活動由一項「歡迎學生回到非洲」的

節目展開。首先是拜訪Sterkfontein洞窟，它是世界遺跡，科學家在此找到很多人類祖先和其他動物的化石。這在400萬年前，人類那時剛剛才誕生。最重要和最著名的化石是「Mrs Ples」，它是一個210萬年前的Australopithecus頭顱；另外一個是「Little Foot」，一副300多萬年前、幾近完整的Australopithecus骨架。這趟歷史巡禮結束後，師生們就搭巴士和船到了島上。

這次活動有4天，學生和教授都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討論非常熱烈，來自不同文化的參與者也讓會議更加有意義。在這夏季所舉辦的活動也包括了一些遊戲，以及乘船環繞島嶼，讓大家更能認識彼此。最後的壓軸是南非傳統的braai (barbecue)和營火。星期六的時候，透過在Soweto的傳統的shebeen午餐，師生們瞭解了南非的歷史文化。離別晚宴在當晚的The View Hotel舉行，讓大家對Johannesburg的Melville Koppies Nature Reserve留下深刻的印象。

總之，我要謝謝人文學院院長Rory Ryan教授，提供了此次活動的金錢援助。我相信博士班實驗室的成員在Johannesburg擁有了美好愉快的回憶。 ■

> 社會學之旅

by Laleh Behbehani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Laleh Behbehanian負責ISA「社會學之旅」(Journeys through Sociology)這個計畫案。全球對話希望她來談談她從這訪談執行委員的經驗中學習到了什麼。

社會學之旅是一系列對ISA執行委員的訪談。透過Skype，我們提供了珍貴的機會讓大家可以瞭解這些社會學家學習社會學的私人趣事和心路歷程。訪談主要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他/她們怎麼會對社會學感到興趣的；第二個是他/她們所面對到的挑戰為何。所有的訪談都可以在ISA的網站上看到：<http://www.isa-sociology.org/journeys-through-sociology/>

雖然訪談之中充滿了各式各樣豐富的故事，但是我們還是會發現有些經驗是大家都共享的。最基本的是他們都表露出了對這個社會世界無比的好奇心。因此，當佐藤嘉倫談到如何接觸社會學時，他說是為了理解「社會謎題」而開始的；而Jennifer Platt則描述了處理各種

資料時的雀躍與興奮。對於多數學者而言，他們對社會學的好奇通常來自於遷徙和旅行的經驗。Michael Burawoy的社會學想像被到美國、印度、尚比亞的旅行經驗所驅使。Habibul Khondker的從巴格達到加拿大、新加坡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遷徙經驗深深影響了他將自己定位成從事比較研究的巡迴社會學家。Tom Dwyer提到了早年生長在一個紐西蘭的愛爾蘭移民家庭，年輕時到處去旅行，這樣的「陌生人」經驗形塑了他的社會學想像。Vineeta Sinha也提到了類似的概念，當她的社會學老師帶給了她某種社會學知識的「不安」時，她其實是很興奮地運用新的框架去詮釋這個世界。

許多學者當初都是被他們的老師所啟發的。這或許並不意外。他們也

想將這樣的啟發帶給他們現在的學生。Tina Uys就敘述到她的老師當初所帶給她的深刻印樣，並且如和運用社會學去理解和處理現在南非學生所面臨的挑戰。同樣也是來自南非Simon Mapadimengwas當初被一位實際參與反種族隔離運動的老師所啟蒙，並且讓他立定志向要教育好下一代的黑人學生。

此外，有個主題重複不斷地出現在訪談中，那就是社會學知識作為改變社會的一種媒介，並且社會學用來處理政治、經濟問題的潛力。Jaime Jiménez回憶到在1958年時，當時他還是學生，並在使用墨西哥的第一部電腦時讓他下定決心要使用量化方法去做研究，並解決墨西哥的社會問題。Dilek Cindoglu則是被1970年土耳其的政治動盪喚起了社會學的興趣。他說：「我

當時想要知道土耳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初衷至今依舊不變！」

而許多的訪談都提到了個人生命和歷史的交會如何激發了社會學的興趣。Ishwar Modi說到了印度獨立時期社會科學家如何投身國家的重建和發展。伊慶春是被1970年代台灣的鉅變所激發興趣。而Emma Porio則是出自想要理解菲律賓戒嚴時期的快速社會變遷。Elena Zdravomyslova 則講述了她父親和她父親的同事在建立蘇維埃社會學時的故事如何影響了她，以及在1970年代如何對社會學幻滅，還有在共產瓦解之後社會學的復甦。

訪談的另一個主題是學者所面對的挑戰。有些挑戰和困難來自於性別、族群、民族的差異。許多全球南方的社會學家都談論到了他們百般努力想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社會學理論疆界，以及社會學知識生產的全球不平等現象(語言、出版機會、研究喜好等)。

很多學者也都積極地從事地方紮根和放眼全球的研究。Sari Hanafi 很巧妙地說明了南方學者的困境：

「publishing globally and perishing locally」和「publishing locally and perishing locally」。

其他還有很多挑戰是這些學者都同時面臨到的，其中包括了學科界線的問題。Raquel Sosa說她很努力地要在拉美發展科際整合研究，試圖找出新的社會解釋框架。Robert van Krieken認為社會學可以在科際整合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其他也有蠻多人提到社會學家多重身份之間的平衡(教學、研究、行政、運動等)。以及在社會學研究的不同要素間的協商問題(專業、批判、政策、公共)。Margaret Abraham透過對於美國南亞社群的家庭暴力研究和社運經驗去探討這個挑戰。

訪談中也可以看到社會學對不同文化、不同世代的意義和影響。他們也都談到了身為ISA執委的趣事。如果你不知道我在

說什麼，請到每個訪談最後，看看當他們被問到若不當社會學家而要做什麼的這個問題時，注意他們是怎麼回答的：當律師、醫生、記者、建築師，甚至是跳肚皮舞、芭蕾舞、開吧台、木匠，或是主持名為「stirring it up」烹飪節目。我們真的很幸運可以有這些有趣又有人性的學者來擔任ISA的執委。



> 阿拉伯抗爭

社會學觀點和比較

by Amina Arabi和Julian Jürgenmey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黎巴嫩



在Mohamed Mahmoud Street上的革命藝術，Cairo。Mona Abaza攝影。

阿拉伯世界的群眾抗議仍前途未卜。不過有一點很清楚的是，自從殖民結束和阿拉伯例外主義以來，這裡的政治地景變得更難預測。2012年3月20-21日，在Beirut的American University舉行了一場會議，與會者包括來自阿拉伯世界、北美、南美、印度、歐洲的學

者，齊聚一堂討論最近的社會抗議風潮。會議裡面特別聚焦在那些往往被忽略的觀點，並且試圖透過比較與歷史的方法去發展出新的解釋框架。

會議中，Markus Schulz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報告了佔領華爾街運動，並從比較的視野去拓深社會運動的理

論架構。阿拉伯社運和佔領華爾街之間的平行相似性其實相當明顯，像是論述、去中心化等特質。阿拉伯革命的個案中，Mohammed Bamye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就追溯了無政府主義的歷史。他認為阿拉伯世界的群眾運動是一種歷史記憶的表現，一種對威權的懷疑，進而奮力

>>

爭求民主。

對民主的渴求到底在這些抗爭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這問題其實一直爭辯不休。即使參加抗議的人都同意是因為經濟因素而走上街頭，但是他們卻都反對過度化約的唯物論解釋和不恰當的阿拉伯社會轉型理論架構。Abdulhadi Khalaf (Lund University)則以巴林的個案來說明這是一個絕對的政治反抗運動——反對國王的統治、愚民政策(bread and circuses)以及要求公民權利，拒絕只是當臣民。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在抗議中看到了新的政治主體的浮現，和新自由主義形成強烈鮮明的對比。他們提出了集體的解放計畫，訴求積極改變社會關係，甚至改變整個集體。用Hanafi的話來說：「反身的自由主義」可以超越派系和道德分裂，然後邁向新的愛國主義。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突尼西亞或是埃及，後革命的投票行為還是被族群和宗派忠誠所決定。

Raquel Sosa Elízaga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和Edgardo Lander (Venezuelan Central University, Caracas)從拉美的經驗呼籲更徹底的社會革命，而非政體轉型而已。唯有如此才可能克服剝削和壓迫的結構。這種結構性壓迫，在拉美就是「協商轉型」都後果。Tina Uys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也以南非的協商轉型為例說明這種歷史過程的保

守性格。

以拉美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軍隊或武裝勢力是轉型中的重要行動者。Yezid Sayigh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Beirut)指出在阿拉伯世界亦是如此，若是武裝勢力在威權時期就是關鍵的行動者，那麼結果便是武裝的勢力會在轉型之後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如此一來，民兵部隊之間的關係與組成就是後革命時期這些政府所要面臨的重要議題。武裝份子通常是社會長期建立過程的干擾者，所以Sayigh認為可能非常難以去約束社會中的軍隊勢力。此外，Mona Abaza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也討論公共領域中革命勢力與軍隊勢力的分裂。她在她的文章「後革命時期的省思」中就指出埃及的軍隊仍然不受民主體制所掌控，且仍企圖想要掌握大權。

土耳其的軍民關係仍常常被用來作為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典型案例。Dilek Cindoğlu (Bilkent University, Ankara)對此提出質疑。他指出了土耳其民主的一些缺點，並提醒「性別盲民主化」所可能帶來的危險。Fatima Kubaissi (Qatar University)和Jan Marie Fritz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美國)則進一步闡釋女性在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性，Fritz強調政治變遷的機遇性開啟了社會轉型和女性培力的政治機會。

至於要培力什麼人才可以鞏固民主呢？Justin Gen-

gler (Qatar University)認為傳統的一些價值可以被轉譯進而支持民主價值。以World Values Survey為基礎，Gengler提出了一個爭議性的假設：公民社會不是一個民主化的管道，反而有利於侍從體制的鞏固。Göran Therbor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延伸了Gengler的論點，認為即使在民主國家，公民社會通常是群眾利益的集合，而非民主價值的展現場域。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謝謝Hanafi的靈機一動，促成了此次會議。這次會議對於比較民主化而言踏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只有少數的參與者特別鎖定在阿拉伯經驗本身，討論很細節的經驗案例。所以，一個比較普遍的比較框架是可以發展的。我們必須記住阿拉伯革命的自發性不可能被任何決定性的框架來解釋，反而是要如Göran Therborn所言，以人類行動的不可預期性來理解。因此，Nahla Chahal (al-Safeer newspaper)在她的演講中提醒我們，研究政治的學者必須抓住這次歷史時刻，並將理論轉化成革命的實踐。■

> 社會學是單數或是複數？ 波蘭觀點

by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1,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蘭



在Warsaw討論社會學的未來。

全球對話2.2期對於不平等的辯論相當精采，而這也正好是波蘭出版的第一份全球對話。我們以學生為主的Public Sociology Lab編輯團隊決定要把辯論從全球的層次拉到地方，所以我們進行了一個研討會，討論由Piotr Sztompka和他的反對者所提出的問題，並從波蘭的角度切入。

這個研討會在2012年1月19日舉行，吸引了來自本大

學和其他大學的學生、博士候選人、教授等前來參加。每一位與會者都可以自在的發表意見，不過我們還是有三位演講者。Anna Giza-Poleszczuk教授是著名的家庭社會學與社會關係學家，並活躍於波蘭的NGO。Antoni Sułek教授是前波蘭社會學會(PTS)的會長，專長是方法論，公共意見，以及波蘭社會學史。Izabela Wagner博士的領域是科學家和音樂家的專業生涯，她在法國、波蘭

、美國等地進行研究，並在Paris的EHESS和Harvard University等地的學者有合作。

討論的範圍非常廣泛，從社會學內部的爭議到波蘭於2011年實施的政治與教育改革等議題。不過主要我們還是在討論複數社會學的可能性。因為我們若都同意在地或地方的社會學對於處理在地的議題是有必要的話，那麼這個問題就至關重要。所以，核心待解的問題是：社

>>

會學是單數還是複數？

Wagner博士藉著指出社會學家之間的分野和不平等來開啟整個討論。衝突不只存在於北方和南方、西方和東方、菁英和非菁英的社會學家之間而已，衝突還存在於理論家和民族誌學者之間。對Izabela Wagner來說，Piotr Sztompka和Michael Burawoy的相反看法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生涯和社會背景。她用分子生物學為例來解釋。她說，分子生物學向來是實驗室導向的科學，利用in vitro方法去找出科學的結果。大家認為這是人造的假結果，所以in vivo方法就取而代之。雖然這個方法很耗費資源，而且將近95%的機率會失敗，不過若成功的話，結果則相當可信，因為是建立在真實經驗的實驗上。in vitro方法類似於社會學中的理論研究，而in vivo則像是民族誌研究，從田野中得到理論。Wagner博士希望社會學可以像生物學那樣轉向in vivo方法。

Antoni Sulek教授提出了另外一種定義社會學的取徑，認為社會學是「論述社會的科學」，不是「關於社會的科學」。因此，我們可以討論論述社會的語言的多元性，就像我們也可以討論社會的多樣性一樣。後者可能是個無解的謎題(不同的社會到底有多麼不同)。反之，若我們考慮到我們所使用的社會學語言，就會發現普遍和個殊之間的對立就是虛假的。Sulek提出社會學有兩種理路。第一種是社會學家之間的溝通。如此，英語發表不但是可接受的，還是可欲的。就是「社會學家面向世界，然後用世界的語言與世界溝通。」這個目的是用理論的語言去討論經驗現象，所以脈絡在此並非重點。但是，我們還有另一種理路，

就是社會學家和社會對話。這就是社會學的關鍵所在。Sulek教授說這個理路的最佳方案就是社會學式的寫作，使用大眾的語言而非學術語彙。要注意的是，這不能和名嘴社會學家搞混，因為後者比較像是明星，而非學者。

Anna Giza-Poleszczuk教授也提出了另類的社會學版本。她說在尋找普遍社會學的時候，我們必須問下列三個重要的問題：第一，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機會去發表他或她的普遍理論嗎？我們認為機制可以保護社會學被少數人獨占嗎？第二，誰設定了社會學的研究議程？誰決定了什麼問題是這個領域的重要問題？第三，大家真的都在討論同一件事情嗎？不同社會之間的差異不只是表現在社會邏輯的再現而已，理論也決定了我們如何觀看這個世界的確，有些理論的確不太好，就像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套用在一個沒有市場經濟的國家。

Giza-Poleszczuk還提到了最近波蘭在公共社會學的架構下的教育改革²。Maciej Gdula是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的指導教授。他認為改革大大地影響了波蘭的學術環境。後果就是讓波蘭學術界變得更像美國，因為採用SCI作為學術評鑑的指標，而非去考慮出版的文章是否真的對波蘭社會有意義。公共社會學並不是要去得到國際的認可，而是要在當地社會建立起脈絡性的連帶。

學術依賴性提供了另一個很好的框架去分析波蘭的學術體制。可是這個會議無法給出一個確定的結論。因為就如Jeffrey C. Alexander在全球對話2.3所說的，在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之間的爭議不可能一了百了，不過可以定期地更新我們對這個議題的

理解。我們可以去找出一些共識，像是Sulek就在會議尾聲時強調：真正重要的是從事「好的社會學」。我們都有自由去設定各自的好壞標準，而接下來要做的是就是去實踐這個標準。

在此，我們的結論非常重要：社會學不必削足適履，一心一意想成為所謂「好的科學」；但是，若我們認同公共社會學的理念，甚至認同解釋地方問題而發展地方社會學的重要性，那麼我們就有必要發展出判斷標準，以科學的角度去評斷研究的良窳。■

註解：

1. Koło Naukowe Socjologii Publicznej (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由University of Warsaw的社會學研究所學生所組成。若要聯絡我們，請至：public.sociology.kn@uw.edu.pl或是到<http://www.facebook.com/sociologiapubliczna>

2. 更多關於波蘭教育改革的文章，可前往Izabela Wagner和Anna Szołucha的ISA blog (<http://www.isa-sociology.org/universities-in-crisis/>)

> 青春與活力： 這就是我們的團隊！

by Reyhaneh Javadi · University of Tehran · 伊朗

當我們在翻譯上一期的日本團隊介紹時，當看到他/她們的學歷和研究領域心裡不禁這麼驚呼：「天啊！他們全都是教授和博士生，而我們只是一群小孩子！」

沒錯，這就是我們！我們是一群非常年輕的社會學家。由於我們認為需要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所以我們自己在University of Tehran組織了社會學學生會。我們想要挑戰現有的教育系統，希望改善它。我們的核心會員是由學生成員所選出，任期為1年。

就在我們的組織停止運作幾年之後，去年又恢復了。我們的核心成員包括了Saghar Bozorgi, Najmeh Taheri, Elahe Noori, Mitra Daneshvar, Faezeh Khajezade, Somaieh Rostampour, 和Reyhaneh Javadi。現在的團對在一個月前開始工作。有些新面孔是剛畢業的學生：Nastaran Mahmoudzadeh,

Tara Asgari Laleh, and Zahra Babaei。除了2位研究生，其他都是大學生。還有，我們都是女性！

我們的團對首要工作是組織讀書會，研讀社會學經典作品。此外也舉辦工作坊，像是伊朗宗教社會學。也舉行攝影展，演講，邀請到Michael Burawoy (Public Sociology)和Jennifer Platt (History of Sociology)。最後我們還發行了一份學生刊物Sareh (Pure)，每一期包含兩個部分。第一是社會學教學的批判性反省。第二是翻譯社會學家的作品。

翻譯全球對話是我們的任務之一。和其他團隊不一樣的是，我們是共同選出翻譯者。這大大的激發了我們的學術熱忱。所以每一期我們由教授跟大家宣布，徵求有興趣的譯者繳交一份試譯稿。每一期我們選出最好的4名譯者。以下是我們譯者群的簡介。



Reyhaneh Javadi: University of Tehran (UT) 社會學研究生，從UT社會系畢業。她的研究領域是19和20世紀的伊朗歷史社會學。



Jalal Karimian: Shahid Beheshti University (SBU) 哲學系研究生。他從UT拿到社會科學學士。現在研究存在主義和宗教現象學，同時對公共社會學也很感興趣。



Shahrard Shahvand: UT國際關係研究生，畢業於Persian Gulf University (PGU) 化工系。他的研究聚焦在宗教、文化、政治，特別是南亞和巴基斯坦。



Saghar Bozorgi: UT社會系學生。她的研究興趣是歷史社會學和現代伊朗。

>>



Najmeh Taheri : UT社會系學生。



Tara Asgari Laleh : UT社會系學生。



Fatemeh Moghaddasi : Al-lameh Tabataba' i University (ATU)的社會學研究生，畢業於UT社會系。他的主要興趣是教育社會學和公共社會學，著重在伊朗的公共社會學歷史和公共社會學在教育體系中的拓展。



Zeinab Nesar : UT社會學研究生。她畢業於UT，興趣為性別研究。



Faezeh Esmaili : UT社會學研究生，畢業於SBU。她的興趣是Pahlavi時代的社會政策。



Mitra Daneshvar : UT社會學學生。她正在研究青少年偏差，特別是伊朗的死刑。

我們很高興也很榮幸可以加入全球對話的行列！ ■

> 法語社會學

by André Petitat, University of Lausanne, 瑞士, AISLF會長



Georges Gurvitch (1894-1965) - 生於蘇聯的法國知識分子與教授，也曾經帶領過AISLF。

第19屆的全球法語社會學會(AISLF)大會將在2012年7月2-7日於Rabat舉行。AISLF是ISA的會員，創立於1958年。當時是一個美國軍事、經濟、科技、

科學的霸權年代。顯然地，那個時候並非所有的人都願意跟隨美國功能論和統計實徵的步伐從事研究。相較之下，歐陸的方法更能敏銳地關照到社會的衝突與轉變。像是相當有名的學者Georges Gurvitch就延續Sorokin對於美國testomania 和quantophrenia的批評，發展出其對美國方法論的批判。雖然

>>

麥卡錫主義的狂熱在1954年就結束了，但是卻對美國社會學產生了實質的影響。

由於在理論上和意識型態上和美國大相逕庭，加上英語霸權，促使了AISLF的成立。因此，AISLF本身即是科學的政治行動，亦是語言的政治行動，目的在於維護社會學知識生產的多元，以及語言多樣性，並藉由結合兩者達成此一目標。

長期下來AISLF成長為擁有1800多名會員，由50多個國家所組成的學術性組織。AISLF不是一個地域或是國家的集合，而是文化語言的空間，由許多的國家、區域教育機構、研究中心等全法語或部分法語的單位所組成。有些人甚至是喜好法語社會學但卻在非法語系國家中被孤立的學者。這樣的一個「區域語言」學術組織擁有超過50個的主題小組，並有一份線上期刊：SociologieS；此外，透過Rédoc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Doctoral Schools) 我們提供年輕學術人員的訓練，每年定期舉辦暑期課程。AISLF的活動會定期記錄在Lettre de l' AISLF。欲瞭解更多的

細節可前往aislf.org。

AISLF也是一個國際性的辯論空間。辯論包括了法語社會學中的各種「學派」之間的爭議，在這之中AISLF並不會預設特定的立場。如此一來，AISLF是在實踐其創立的目標：維護社會學的多元，並鼓勵組織內的辯論風氣。這項目標始終如一。AISLF作為一個文化語言的組織，讓那些在國家層次上所創生的概念，得以超越原本過於限縮的發展空間，並得到機會可以發芽茁壯。社會學若是要能蓬勃發展，那麼就必須有這麼樣的組織去支撐起一個語言近似性的空間。而ISA的一項任務也是去促進區域和國家之間的交流對話，會長Michael Burawoy也正是當今此一任務的推動者。

我們都很清楚語言空間是不平等且階層化的。而英語位居於最上層階級。多重因素導致了這個霸權的產生，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在每一個語言空間的內部也有其自身的不平等和階層結構。以法語作為閱讀與寫作的媒介這件事情，對於賽內加爾和摩洛哥，以及對於法國和加拿大魁北克來說，意義

是大不相同的。在法語內部地確也有不平等的階層化問題。

當初AISLF所成立的背景脈絡已經是成為歷史了。現在美國的社會學比起以往已經變得更加多元。美國外銷最成功的兩項理論產品：理性選擇論和符號互動論，如今已經成為法語社會學的重要理論。這個結果或許和社會學的次領域分化多少也有些關係。

二元對立的世界(1950-1970)已經衍變成多中心的世界了。我們現在是身處於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度裡面，這個國度擁有許多新的文化獨立單位，人們、商品、資訊之間也充滿較多的流動性。這個世界過多的資訊與科技，或許早已被社會學的創立者預料到了。自由放任的計畫和笛卡爾的科技夢想(自然的主人與國王)帶來了經濟與生態的不確定性，人類也要求更多對於危機的管制，以免在這矛盾巨浪中滅頂。AISLF的19屆大會主題是「不確定性」，我們希望藉此希望可以為當前人類社會的困境找到新的生機。 ■

> 歷史一隅：

更多關於AISLF的歷史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國, 出版副會長

這裡對於André Petitat的文章作點歷史背景的補充，著重在AISLF和ISA的關係上。這兩者其實曾經有過內部的衝突。1949年ISA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而其總部長年設在巴黎。雖然隨著美國在戰後躍居於宰制地位，法語日漸式微，可是在此之前，法語總是擁有形式和實質上的重要性，且是外交的主要語言。之前ISA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和法語，排除了其他有著早期社會學歷史的語言，因為，在大戰時期，這些語言站在法西斯主義那邊。當ISA越來越獨立於UNESCO之後，法語就越來越失去其重要性，也因此Georges Gurvitch在當時提出了設立ISA法語分會的構想。但是由於這違背國際主義的精神，所以被否決了。1958年則誕生了獨立的AISLF由Gurvitch和比利時社會學家Henri Janne所創。不過在1963年時其加入了ISA成為集體會員。或許這也促成了AISLF的執行委員Girod成為了後來ISA的秘書！

ISA的定期活動通常都是由國家會員為主要貢獻者。但若考慮語言而非考慮地區時，情況就有所不同了。誠如Petitiat所言，法國並非是ISA中唯一的法語貢獻者，其他像是比利時、加拿大、瑞士等也都有

著重要的地位。從1949到1956年，ISA的會長皆為美國籍，而只有其中一任的副會長是法國籍的Georges Davy。不過1956-1959年的會長是法籍的Georges Friedmann。之後則有著很大的斷層，直到了2006-2009年的Michel Wieviorka才又有法籍會長。不過這幾年之間都仍然維持者有一位法籍執行委員的情況，而且11任副會長中就有7任是法國人。

有3次世界大會舉辦在法語國家(大多是雙語國家)：1953年在Liège，1966年在Evian，1998年在Montréal。而在總部設於Madrid之前，有3任秘書處設於法語國家(1959-62在Louvain，1962-7在Genève，1974-82在Montréal)。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著名的會員像是Anouar Abdel-Malek，雖然不是法國人，但是卻在巴黎工作過，或是和法國的有很深的淵源。同樣地，像是法語的移民如Jacques Dofny從比利時移民到魁北克，則建立了重要的連帶。由此可見語言如何建立了社會連帶，也體現了不同的身份認同。 ■

> 印度社會學

面對的挑戰

by Ishwar Modi，印度社會學會長，ISA執委



圖：Ishwar Modi點燃蠟燭(ISS在Jaipur召開的年度會議)。

紀印度社會學的座右銘。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印度要向巴西、俄羅斯、中國、南非等國學習。東歐後社會主義的經驗也值得我們借鑒。印度還要向東方、中東、非洲的本土智識傳統吸取長處，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社會學。換言之，印度不僅要保留西方社會學的優點，還要從發展國家的經驗中獲得啟事。我們也要連結主流印度社會學和印度的地方社會文化。這個目的的達成有賴於我們和地方性的文化組織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總之，我有信心ISS可以實現這三個願景！ ■

Reference

Modi, I. (2010) "Indian Sociology Faces the World." Pp.316-325 in Michael Burawoy, Chang Mau-kuei, and Michelle Fei-yu Hsieh (eds.)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 (Volume I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nd 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印度社會學不論是教學或是研究，水準都相當高。能有今日的成就，印度社會學會(ISS)在過去60年功不可沒。而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從2012年開始擔任為期2年的會長職務。ISS目前擁有3500名印度或是外國的終身會員。然而，印度的社會學目前正站在十次路口上，這間百年老店面臨著許多挑戰。過去的殖民歷史幽靈仍然徘徊在我們的教育與方法裡面，美國的學術霸權也籠罩在我們的上空，影響概念、方法、與理論的建構。印度社會學仍未能在理論和概念發展上獲得成功(Modi, 2010)。

若我們要同情性的理解各種複雜的議題，則理性的本土化需要成為實體。我們

有必要去發展一個切身相關的社會學(relevant sociology)。在我的會長任內，我會去嘗試讓大家討論如何去拓廣印度社會學的眼界，而同時也不能和世界的潮流脫軌。ISS的發聲管道是Sociological Bulletin這份期刊。我們會增加發行期數，拓展主題，多語化，並最後讓它成為國際級的刊物。此外還要製作特刊，資深的社會學家可以為其撰文。還有，我們會進行電子化。

除了Sociological Bulletin的更新之外，我們還要開啟需多新的辯論議題，像是發展、政治的社會基礎、文化認同的新面向，中產階級的擴張，社會不平等，城鄉差距等等。民主的社會學(People's Sociology)將會是21世

> Ankara大學的公共社會學

by Günnur Ertong和Yonca Odabaş, Ankara University, 土耳其



工人聚集在帳篷內抗議TEKEL的新政策。

我們是一群在Ankara University社會系和Aytül Kasapoğlu教授共事的社會學研究生、博士後、和教授。

這個群體成員的更動相當頻繁，人們加入一起學習並分享經驗與知識，主要都是Kasapoğlu教授的指導學生。即使學生畢業或出去工作了，這個研究學習的網絡始終把每個人連結在一起。以下我會簡介我們共同出版和Kasapoğlu教授討論課的經驗，以及一份我們常發表研究成果的刊物。

我們所要出版的一系列書籍是Aytül Kasapoğlu教授上課的內容彙整，主要以學生和老師的研究為主，並結合理論與實踐。第一冊叫做Character in a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探討社會結構下個人特質的消蝕。第二本是New Social Traumas檢視社會創傷的敘事。第三本是Social Life and Conflict: Different Panoramas處理社會生活與衝突等議題。最後一冊是Two Sides of the Coin: Health and Illness，討論公共健康議題。Kasapoğlu教授所的討論課會引導學生閱讀相關的文獻，刺激新的想法。畢業的學生還是會回來上討論課並發言，啟發的許多新面孔。

我們最近完成的一項田野研究是關於2009年12月的TEKEL罷工。TEKEL一間很大的菸酒國營企業。罷工則在Ankara (土耳其首都)持續了78天。罷工起因於工人階層位置的改變。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導致人事開銷增加，使得公司開始雇用臨時工，使得有保障的工人迅速減

少。

工人很抗拒這波「彈性化」政策，從2009年12月14日開始罷工，而警方也採用鎮壓手段。由於天氣寒冷和政府遲遲不回應，TEKEL工人開始在街上紮營抗爭。這些帳棚引來了大量民眾的注意。儘管政府的態度強硬，工人還是受到來自各方，例如科學家、藝術家、或學生的廣泛支持。我們的研究團隊也前往支持，並從事研究，並在罷工現場運用Herbert Blumer的群眾動員理論去協助TEKEL工人。這項研究我們發表在2009年9月的歐洲社會學年會上(ESA)

Yurt ve Dünya - 家鄉和世界 - 是一份從2010年開始發行的線上刊物(www.yurtvedunya.net)。不過它的歷史可長了。Yurt ve Dünya在1941年就發行了第一期。我們後來受到了Michael Burawoy的公共社會學運動所啟發，決定重新出版Yurt ve Dünya，希望可以激起師生的研究能量。主要目標是跟公眾分享社會學研究的知識，而首要的公眾對象就是土耳其各大學的社會系學生。

我們正在計畫把這樣的公共社會學延伸到國際場域。而且我們都是ISA和ASA的會員。因為我們也知道國家層次和國際層次的學術合作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也很積極參與在國內的組織。 ■

我們很高興可以發展出這麼一個協力研究的文化和公共社會學。若任何任對我們的團隊感到興趣，請聯繫：

Aytül Kasapoğlu: lukasap@humanity.ankara.edu.tr

Yonca Odabaş: yoncaodabas@yahoo.com

Günnur Ertong: gertong07@gmail.com

> 民主化未來： 尋找平等和參與

by Markus S. Schulz,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美國, ISA橫濱世界大會計畫委員



Plaza de Mayo的母親們，Buenos。
Markus Schulz攝影。

ISA的未來研究委員會(Futures Research; RC07)將在Buenos Aires召開的論壇中聚首，並以「民主化未來」為主題。這個主題和論壇的主旨「社會正義和民主化」相呼應。這個題目有雙重意義：若是以形容詞的方式來理解，那「民主化」代表了未來會帶來更多

的民主；若以動詞的方式來理解，那「民主化」意味著我們對未來的期待。因此民主化未來其實是我們對於正義和參與的求索。我們有意地將未來加上s (futures)，強調那是複數。如許多後殖民學者，像是Arturo Escobar, Aníbal Quijano, Walter Mignolo, 和Boaventura de Sousa San-

tos所宣稱的，我們需要複數的知識論。儘管他們的主張很細心且吸引人，可是單一線性的模式已經不能描述人類的歷史。橫斷的概念似乎更能妥善解釋混亂且爭議性的社會真實。民主化未來在這個意義下即是在各種不同版本的世界觀之間進行對話。

在9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

>>



佔領華爾街運動在New York的Zuccotti Park。Markus Schulz攝影。

為前提下，未來似乎就在咫尺，新自由主義主導了世界的秩序與走向。挑戰則遍地開花，從Chiapas叢林到Seattle，Prague，Genoa 或是Davos等城市都見得到。全球的權力菁英關起門來開他們的高峰會。恐懼政治以全球反恐戰爭為名席捲各地，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帝國的擴張，直到了金融危機發聲，媒體才開始趕潮流談論資本主義的盡頭。這些新聞標題並不成熟，而且數十億的銀行杼困案一夜之間就被敲定，不過，這也顯示了我們的經濟體制多麼岌岌可危。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後國力日益下滑，並還要面對中國等其他國家崛起，南美國家如阿根廷、委內瑞拉、巴西、厄瓜多等找到了新的方式去拒絕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的有條件措施，發展自己的道路。阿拉伯世界風起雲湧的抗爭浪潮趕走了萬年暴君，開啟了該地區民主化的新扉頁，甚至對美國造成了影響。

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從一開始的小抗爭演變成全國

性的運動。雖然這個運動被一些大企業媒體嘲笑缺乏明確的訴求，但是就是因為沒有意識型態才使得它那麼受到廣泛迴響。最重要的是佔領紐約的Liberty Square，就像佔領其他的廣場一樣，用意在於開啟對話的空間。並且將「半公共」且由大企業所擁有的Zuccotti Park 轉變為擁有藝術、音樂、共享食物、圖書館、辯論等的公共領域。辯論不僅關乎1%的人利益，更是和其他99%的人息息相關。就像那些自製的標語所言，這個運動的訴求其實很明確，從公平經濟到環保，從稅制到選舉經費改革。運動的軸線就是要求還政於民。運動也挑戰不平等和企業過度干政的現象。警察雖然成功地壓制了許多成是的佔領運動，不過新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從中獲取了經驗，將對民主化未來帶來深遠影響。

社會學可以從這個運動學習到未來的可塑性。RC07在 Buenos Aires的論壇中將會觸及幾個問題：我們如何建立一個更民主

的未來？對未來的想像和期待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什麼決定了我們想像的視野？在全球化時代裡如何重新思考民主？如何以永續的思維去解決氣候變遷、環境惡化、飢餓、暴力等問題？如何民主化公共治理、基礎建設、生產、媒體、和科技。食物、風險、機會的分配怎麼才可以更平等？比較研究可以讓我們學到些什麼？解放運動如何實踐以對抗管制、剝削、和象徵暴力？什麼樣的未來是可欲、可求、可及的？社會要怎麼轉型？未來研究如何和更廣泛的公共辯論產生關連？

我們很謝謝Alberto Bialakowsky、Alicia Palermo、Margaret Abraham、Michael Burawoy、和Raquel Sosa，沒有他/她們，論壇不可能成功。讓我們期待在Buenos Aires的世界論壇！ ■